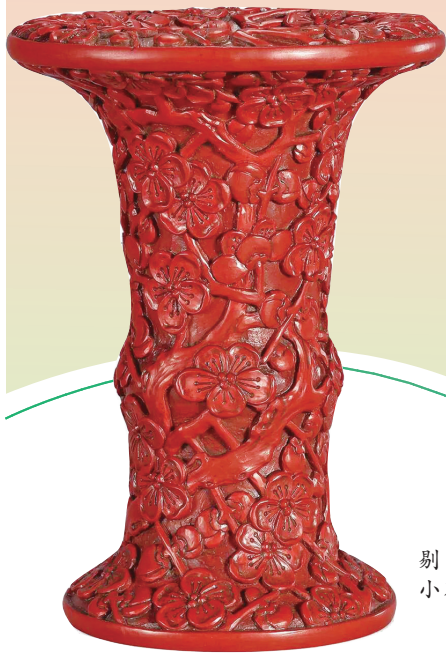


文房清供里的春日意趣



明代
剔红梅花纹
小花觚。

寒尽春回，草木萌新。古人常以花木寄情，盛放的春日之花，不仅引人流连，亦可入画入器、养眼怡心。那些花卉元素的文房清供、案头文玩，由此也成为书房案几间的一道独特风景，既承载着文人墨客的风雅情致，也凝聚着生生不息的春日意趣。

►清中期蜜蜡
玉兰花式洗。



►清代
珐琅彩山石
花卉纹小瓶。



梅花与兰、竹、菊并称“花中四君子”，自古以其傲人的风骨受到喜爱。梅花通常在冬春之交凌寒绽放，因此也被视为春天到来的信使。2025年北京保利拍卖20周年秋季庆典拍卖会上，一件明代剔红梅花纹小花觚引人注目。花觚是一种用于陈设或插花的器物，其形制源自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“觚”。这件明代剔红梅花纹小花觚用料精良、雕工高超，直径7.1厘米，侈口，长颈，鼓腹，圈足外撇，纤美典雅，颇具商周青铜器神韵，体现了晚明文人慕古之雅意，为当时宫廷陈设的典型器物。花觚通体以朱漆剔刻梅花纹饰，构图饱满，层次分明。盛放的梅花与累累花苞疏密有致地分布于觚身各处，纹饰布局繁而不乱。器物所施剔红工艺，漆层肥厚，下刀干净利落，打磨圆熟，朱漆色泽纯正。底足内原色漆地上，以朱漆书“大明万历年制”款。剔红又称“雕红漆”，在漆器家族中堪称“功夫之最”，其工艺之繁令人咋舌：先以木灰或金属为胎，一遍遍髹涂红漆，少则八九十层，多则百余层，直到累积起足够的厚度。待漆半干时，描上画稿，必须在干湿恰到好处火候下迅速雕刻——过干则脆，过湿则粘刀，分毫之差便会毁了百层功夫。明万历一朝，宫廷御用漆器制作空前繁荣，由内府果园厂专司其职。明代高濂在《燕闲清赏笺》中记载，果园厂剔红漆朱三十六遍为足；而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的一件清代剔红龙纹宝座，髹漆竟超百遍，可见匠人之执着。

早春时节，玉兰用一树树的花朵抢先报春。“翠条多力引风长，点破银花玉雪香。”明代文徵明的《咏玉兰》，写出了春风和绿枝合力催发，玉兰如雪花般飘落、散发迷人香味的情状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枚明万历年间的玉兰形墨，高6.8厘米，长径2.3厘米，短径1.1厘米，以圆雕技法塑玉兰花瓣形态。其造型优雅婀娜，花瓣纹理细腻入微，每一处线条皆流畅自然，蕴含着仿佛即将喷薄而出的生机。一枚花瓣镌“长吉”篆文小印，说明此为明代制墨名家黄长吉所制。在中国制墨业的发展历程中，明代晚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。这一时期，制墨领域璀璨繁荣、群星闪耀，众多名家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技艺和令人惊叹的创造力，装饰题材也是丰富多样。就像这枚玉兰形墨，作为明清墨品中罕见的立体造型实物，展现了墨模雕刻技术的高超水平。

明代玉兰形墨。



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一只明代犀角雕玉兰形杯，高7.8厘米，口径13.5厘米，以亚洲犀牛角雕成，杯色棕黄中透着红润。明代初期，文玩清供之风盛行，文人雅士热衷于参与金石、竹木、犀角、象牙等的雕刻。此杯敞阔的杯口被雕成五瓣绽放的玉兰花，精雕入微，栩栩如生。杯侧雕一枝点缀着两朵花蕾的枝干作为杯柄，又巧妙地将连着花蕾和硕叶的枝茎雕成圈，盘绕于杯底作为杯足。杯身上浮雕的叶片和花蕾，前后交错，姿态万千。

中国嘉德2025春季拍卖会曾拍过一件清中期蜜蜡玉兰花式洗，最宽处直径10厘米，重约73克。水洗、水盂作为文房用具，除实用意义外，还带有观赏陈设性质，与砚田相伴，与文人相对，既清心乐志，又可助文思。这件玉兰花式洗为红种蜜蜡材质，色泽红醇，包浆古穆，质地光洁。其以整块大料雕琢，内膛深挖，洗身雕作玉兰枝叶托举花苞之形态，花瓣向外翻卷，娇美灵动。下置原配骨质雕花枝纹器座，盘绕于底部成为底托。整体风格简洁，雕工细腻，蜜蜡的天然纹理清晰毕现。明清时期，人们将不透明的黄白色琥珀称为蜜蜡。清宫中，蜜蜡的生产制作主要在养心殿造办处的玉作进行。

►明代犀
角雕玉兰
形杯。



►清代
粉彩折枝桃
花诗文壁瓶。

(据《中国文化报》)

清代自鸣钟

该铜鎏金嵌宝石自鸣钟高75厘米，为清代宫廷赏玩器。其以宝象驮瓶为装饰，镶嵌绿松石、青金石、红碧玺，寓意“太平有象”，有着太平盛世的美好寓意。

据介绍，此自鸣钟的装饰风格为中西合璧，其造型精美，结构复杂，显得典雅华贵、绚丽夺目，为清乾隆年间宫廷器物。(据《侨乡科技报》)



春品一枝杏花韵



《杏花图》。

宋代赵昌的《杏花图》(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)，虽为小品，却极尽写生之能事。此画以极写实的手法，将杏花的娇俏姿态刻画得栩栩如生。画面中杏花盛开，粉白含俏，堆霜集雪，尽显其晶莹剔透、冰姿雪清之雅韵。画家在勾线时极为精细，以淡墨细勾花形，极尽正反俯仰透视转折之妙。花瓣主要以白粉染成，只在花苞部分加染胭脂，花萼也以胭脂点染，色泽浓郁，两相衬托，更添一分妩媚。作品设色明润匀薄，特工敷彩，色若堆起。这种设色方法使得画面的视觉效果得“花则含烟带雨，笑脸迎风”之诗意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

品赏以杏花为主题的《杏花图》会发现，因画家的风格、心境和时代背景的不同，作品会呈现出各具特色的艺术风貌，映照出不同时代文人对春天的理解和感悟。当我们细细品味这些画作时，仿佛能听到画家们在画笔下倾诉的心声，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。

赵昌的《杏花图》之所以能够如此生动地展现杏花的形态和神韵，得益于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。他深入自然，用心去感受杏花的生长过程，捕捉到了每一个细微的变化。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关注，使他的画作充满了生命力，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境界。(据《联谊报》)

千年一轿渡红尘



这是一顶微缩的瓷轿，整体呈四方形，底座边长10厘米，通高15.8厘米。轿顶下，四名轿夫肩扛轿杆，透过半悬的门帘，隐约可见轿内跪坐一女子。

这件定窑白釉瓷轿，出土时保存相对完好，仅个别轿夫身体部位略有残缺。轿顶部分采用六角攒尖式设计，顶尖塑一宝珠，弧形轿檐向上翘起，六个坡面各饰一朵宝相花。轿身部分，四名轿夫立于方形平托之上，其中三名轿夫头戴方巾，另一名则头戴花冠，四人皆着短衣长裤，腰扎汗巾，一手把握轿杆，另一手叉于腰侧，姿态生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那位头饰与众不同的轿夫，服装色彩也明显有别于其他三位，整体为黄褐色。这种差异应是工匠有意为之，用以表现轿夫的不同身份或等级。

轿子与轿夫形象的精心塑造，体现了定窑工匠高超的技艺和对细节的孜孜以求。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，定窑以生产精细白瓷闻名于世。在宋代定窑以单色釉为主的背景下，工匠为了突出花轿的主题，特意将轿顶施以褐色釉，与轿身的白釉形成鲜明对比，增强了作品的视觉冲击力。此外，工匠综合运用捏塑、堆贴、镂空、模印、压花、刻花以及点彩等多种技法，将土与火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轿子的前身为肩舆或步辇。直到宋代把肩舆和步辇的乘椅、躺椅改制成厢式，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轿子。到北宋中后期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街巷格局的变化，轿子因其灵活性和舒适性，逐渐成为城市中一种重要的代步工具。(据《中国文化报》)

(据《中国文化报》)

这个秦代“铁疙瘩”

专管缺斤少两

烟台市博物馆收藏着一件重量级铁权——秦嵌铜诏版铁权。这件铁权顶部是半环形鼻，权身呈半球形，平底，底径24.7厘米，高20.5厘米，重32.5公斤，形状就像现在的秤砣。

按照秦代衡制，1石=4钧=120斤，1斤=16两，1两=4铢=24铢。这件现在重65斤的铁权，在秦代有一石(120斤)重。秦权的重量从高到低依次是4钧(120斤)、1钧(30斤)、20斤、16斤、9斤、8斤、5斤、1斤。由此可知，烟台这件秦嵌铜诏版铁权是秦代最重的一款铁权。

这件铁权于1973年在文登被一位刨地的农民发现。当时它灰扑扑的，像

一块普通石头，但这位农民仔细一看，这块大石头上有一块铜诏版，不像是普通的石头，这才让这件珍贵的铁权进入考古人员的视野。

这块铜诏版有什么特别？它长11.08厘米，最宽处8.5厘米，上面阴刻了秦始皇二十六年(公元前221年)诏书文字，竖行排列，共40字：“廿六年，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，黔首大安，立号为皇帝，乃诏丞相状、绾，法度量，则不壹，欺疑者，皆明壹之。”大概的意思就是，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了天下，百姓安宁，立下皇帝称号，于是下诏书于丞相陶说、王绾，依法纠正度量衡器具的不一致，

使有疑问的人都明确起来，统一起来。

何为度量衡？计量长短用的器具叫度，如尺子；测定容积、体积的器皿叫量，如斗、升；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称为衡，如权、天平、秤。作为衡器的一种，秦权虽长得像秤砣，但在用途上并不是搭配秤杆，而是与当时的天平配套使用，相当于现在的砝码。

除了统一度量衡的计量单位，秦代还要由官府制作标准器，作为各地的具体参照物。秦朝还制定了严格的检定制度，每年地方官府都要由专职工匠，根据中央统一颁发的标准器，校正正在使用的度量衡器具。



秦嵌铜诏版铁权。

为何要这么严格地检定？在秦律中，使用度量衡器具出现误差是要被罚的：一石重的衡器误差超过16两，罚管理一副盔甲；误差在16两但在8两以上，罚一面盾牌。

这套严密的度量衡制度，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，也确保了交易公平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。(据《大众日报》)

(据《大众日报》)